



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

蔡毅 编译



文史知识文库

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

蔡毅编译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/中华书局编辑部编. —北京:
中华书局, 2002

(文史知识文库)

ISBN 7-101-03175-7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中国—传统文化—影响—
日本—研究 IV. K313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 092463号

责任编辑: 陈 乔

文史知识文库

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

蔡 毅 编译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1/32·8⁵/。印张·2 插页·174千字

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 定价: 15.00元

ISBN 7-101-03175-7/G·430

1473/11

写在《文史知识文库》之前

这套书本来是以“文史知识丛书”的名义出版的，现在改成“文史知识文库”。“丛书”改成“文库”，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，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、更丰富，不仅容纳《文史知识》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，还要容纳《文史知识》未能刊发的好内容。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、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。

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。中国人民重振雄风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。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正酝酿着新的崛起，新的振兴。

在这一巨大变革中，在计算机、人造卫星、宇宙飞船、超导体、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。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，以至于我们伴随着每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，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，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。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。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、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、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、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，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，对宇宙世界的期待。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，相互辉映，激荡交

融,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,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。这是我们的骄傲,也是我们民族凝聚、发展、强盛的力量。

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,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。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,对这块生我、养我的土地,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,怀着深切的挚爱之情。爱她,了解她,同时研究她;在了解她、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。今天,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,以重新崛起的决心,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,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,区分糟粕,在看来杂乱无章、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,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,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,为我们走向世界、走向未来服务。

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,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。

目 录

中国文学在日本	清水 茂 (1)
中国史学在日本	竺沙雅章 (11)
中国哲学在日本	桥本高胜 (24)
中国儒教在日本	中岛隆藏 (40)
中国道教在日本	千田 稔 (53)
中国禅宗在日本	冲本克己 (65)
中国神话在日本	中西 进 (77)
中国文字在日本	尾崎雄二郎 (88)
中国典籍在日本	严 绍 璜 (105)
中国书法在日本	中田勇次郎 (120)
中国美术在日本	辻 惟雄 (142)
中国音乐在日本	赤松纪彦 (152)
中国园林在日本	田 中 淡 (165)
中国医学在日本	小曾户 洋 (178)
中国历术在日本	王 勇 (191)
中国科技在日本	武田时昌 (204)
中国民俗在日本	马 兴 国 (216)
中国食文化在日本	杂喉 润 (229)
中国茶文化在日本	布目潮颯 (242)
中国酒文化在日本	蔡 毅 (256)

中国文学在日本

清水 茂

—

日本本来没有文字,记录都借用汉字。大家知道现在的假名,都是从汉字的草体(平假名)或者偏旁(片假名)变化而来的。

9世纪初,斋部广成《古语拾遗》序(807年成)说:

“盖闻上古之世,未有文字。贵贱老少,口口相传,前言往行,存而不忘。”

这就是说:日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,也有日本特有的文学,但不是书面文学,而是“口口相传”的口头文学。后来日本借来汉字以后,才记录下“口口相传”的歌谣、历史文学。不过歌谣和历史文学的写法有一点不同。歌谣大都借汉字音来写出,汉字只做表音文字使用,和本义并不相关,这样的用法,后来发展成假名。历史文学有一种大部分用汉文,少部分借汉字音来表示日语,如《古事记》就是这样的;另一种则完全用汉文写成,如《日本书纪》。当时写散文,还没有社会通用的日语写法。因此虽然偶然出现《古事记》那样的文体,但行之不远,

多数仍用汉文。《古事记》好久湮没不闻,《日本书纪》占据了日本正史的地位,其理由大概在此。

日本最古的和歌总集《万叶集》的写法是这样的:一半歌谣,如上面所说专用汉字音表记;另一半歌谣混用汉字的意义和借汉字音表示的日语(特别是虚词),题目却都用汉文写。我想:歌谣的念法,可以口传,散文的读法,倒不容易传下去,所以散文式的题目就使用写法现成的汉文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会写汉文是非常重要的技能。从这里看得到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作用有两个方面:一方面中国文学是日本人写作汉文、汉诗的榜样,另一方面日本文学接受了中国文学的思想、评论、词汇、典故等,使文学丰富美丽了。

二

中国史书从后汉开始,有时记录日本或者倭国遣使的事,而日本史书7世纪以前却没有直接向中国遣史的记事,中国文物都是经过朝鲜半岛才到达日本的。

传说日本最初进口的汉籍,是百济(今朝鲜半岛西南部)博士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时带来的《论语》10卷,《千字文》1卷。这个传说,年代上有很大的疑问,可是我们从这个传说的背景里,看得出日本最初接受的中国书籍是儒学经典和识字课本。以后,经典、课本以外的书也渐渐搭载来日本。

推古天皇十五年(607),日本向中国隋朝派遣国使,开始正式邦交。然后直到9世纪末年,日本国使到隋、唐两朝去了多次,而且每次还派留学生去学习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的进入,比过去经过朝鲜半岛间接接受的时代要丰富得多,尤其是

留学生直接带来中国文化,给日本影响很深。其中当然有中国文学。

8世纪编辑《万叶集》的时期,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《怀风藻》(751年序)成书了。这本总集,虽然收录的是日本8世纪(中国盛唐时)的作品,但诗风还是六朝、初唐那种华丽的宫廷诗。在《万叶集》里,有些汉文的序言在和歌作品的前面,也都是骈文。可以说日本的汉诗、汉文的作风,比中国当时流行的诗风、文风要晚不少。不过也有些书在成书以后,马上就传到日本来。比如张鹭(7世纪末人)的《游仙窟》,已经被《万叶集》引用了。就《万叶集》的编辑年代来说,《游仙窟》算是“当代文学”。

这种中国文学作品很快地传到日本来的情况,在日本屡次出使唐朝的所谓遣唐使时代经常出现。嵯峨天皇(809—823年在位)模仿张志和(约730—约810)的《渔歌子》填词;白居易(772—846)的《文集》,在作者还活着的日本承和五年(838),就传到了日本。

不过,这种日中文化交流密切的情况,从9世纪末年日本废止遣唐使以后,就完全改变了。关于中国文学的风气变化,日本人差不多无从得知了。

遣唐使将要废止的时候,藤原佐世编辑了一本皇家藏书目录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,现在可从中约略看到当时日本所藏汉籍的情况。关于集部书,大都是初唐以前作家的作品,盛唐以后只有王昌龄、王维、王涯、白居易、元稹的诗文集和刘白唱和集,而没有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的集子。可见当时日本人对于初唐以前的文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,而盛唐以后,就

以元、白为中心，有比较偏向的好尚。

三

断绝日中邦交以后，汉籍进口主要是靠着私商来往。当时执政藤原道长的日记里记载着：长和二年（1013），从中国回来的和尚念救，赠给他《（白氏）文集》刊本。1013年，中国已经是北宋初年，可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，还是向往白居易，好像不大注意中国的当代文学。

这个时代的女评论家清少纳言（约966—约1028）的随笔《枕草子》里，有一部分列举了她有兴趣的文学作品的名字，说：“汉文则（白氏）文集、（昭明）文选、新赋、史记·五帝本纪、愿文、表、博士呈文。”她这样的评价，也是当时人通行的评价。新赋、愿文、表、博士呈文，是日本人的著作，其中有的性质不太明白，现在不论。《白氏文集》、《昭明文选》和《史记》，都是当时日本人爱读的书。同时代的女作家紫式部（约973—约1014）撰写的小说《源氏物语》，屡次引用白居易的作品。例如第一回《桐壶》，有皇上看《长恨歌》画册一段；第十二回《须磨》，被流放的主角源氏吟诵的是“二千里外故人心”，源氏的朋友访问源氏，把他的寓居看做“石阶桂柱竹编墙”，源氏和朋友共吟的是“醉悲洒泪春杯里”。这些诗句，都是白居易的作品。紫式部侍奉彰子皇后，有时给皇后讲白居易《乐府》2卷，可见当时白居易诗的流行。

《史记》也是当时人人必读的书。紫式部在少女时代，有位老师给她哥哥讲《史记》，她在旁边听讲，比她哥哥能早背诵。故事集《今昔物语》载录了不少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记事，年

代较晚的《平家物语》，也有时引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故事来比拟当时的事件。

《昭明文选》则据有汉文典范的地位。藤原明衡(989—1066)编辑《本朝文粹》，收录当时日本人写作的文章，大都是文选体。书名虽然和姚铉《唐文粹》相类，其实编辑态度却和专门选录古文、古诗的《唐文粹》完全不同。

这个日中邦交断绝的时代，因没有直接接触，日本对中国文学新的作风全不知晓，模仿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作品。

四

日本在12世纪末年，皇家常有政争，双方都要靠着武力打倒敌人。结果武士的势力逐渐强大，最后压服贵族，掌握政权，从贵族政治改变为武士政治。武士不重视文学，文学却由禅侣担任了。当时禅侣，很多人到宋朝去求佛法，而且南宋灭亡时，有些中国禅侣避难到日本来，因此禅侣的汉学水平非常高。当时天皇居住的京都和武士开幕府的镰仓，都模仿中国，规定了五山即五座大寺，所以禅侣的文学被叫做“五山文学”。

五山禅侣关于宗教仪礼的文章，还用骈文，有个历史家把它认做五山文学，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。禅侣写关于宗教仪礼的文章，好像官吏写官方的文章一样，不算是文学。

五山文学的特点，是接受宋朝以后的风尚。这个时代，12世纪到16世纪初，在中国是南宋到明朝中叶。日中禅侣来往很密切，因此他们容易带来中国当代的文学。

五山禅侣除了研究佛教以外，时常讲中国文学。现在留下的他们的讲义笔记也不少。就留下的讲义笔记来看，他们

讲的有《韩文》、《胡曾咏史诗》、《长恨歌·琵琶行》、《杜诗》、《柳文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山谷诗》、《东坡诗》、《古文真宝》、《阿房宫赋》、《三体诗》、《联珠诗格》等。除以前时代流行的白居易、《昭明文选》外，还有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黄庭坚等。可见这个时代对文学的评价，和中国当时的评价差不多一样了。

当时有些禅侣去中国的时候，替他的老师向中国有名的文学家请求碑铭。明初，宋濂（1310—1381）撰写《日本普济国师（即梦窗疏石，1276—1351）碑铭》（《翰苑别集》卷三）、《日本建长禅寺古先源禅师（即古先印元，建长寺第三十八代住持）道行碑》（《翰苑别集》卷十）即为其例。

此外，日本留学僧绝海中津（1336—1405）于洪武九年（1376）在南京拜谒明太祖朱元璋，奉呈诗篇，太祖赐和，收在其诗集《蕉坚藁》里。

不仅是绝海中津，当时诗僧的成就普遍较高，如虎关师炼（1278—1346）、雪村友梅（1290—1346）、中岩圆月（1300—1375）、义堂周信（1325—1388）的作品，放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，也可以乱真。

五山禅院还出版书籍。禅院及当时出版家刊行的书，一律叫做五山版。他们除出版有关佛教的书以外，还刊行很多宋、元的文学书。他们刻印的技术非常高妙，有时甚至不能分别原刊本还是复刻本，因此现在很尊重五山版。例如《四部丛刊》里的《皇元风雅》，《四部丛刊书录》说：“高丽翻元刊本。”《中州乐府》，《书录》说：“董氏影元刊本。”其实都是根据五山版复印的。

这个时代的日语文学，却很少有可看的。只有戏剧“能

乐”非常流行，其剧本中有一些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，如《项羽》、《张良》、《皇帝》（杨贵妃故事之一）、《钟馗》、《杨贵妃》、《昭君》（王昭君）、《咸阳宫》（秦始皇）、《邯郸》、《西王母》、《东方朔》、《白乐天》、《猩猩》、《石桥》（天台山）等。自此以后，日本一般人民都熟悉这些故事了。有人说“能乐”受元杂剧的影响而成立，可是这说法没有文献可征，只能备一说而已。

五

16世纪，日本武家政治专权，中央政府的权威衰落，地方诸侯蓄养武力，纷纷自立，互相侵攻，这是所谓日本的战国时代。这一时期无论汉文、汉诗，或者日语文学，值得欣赏的，差不多没有。

到16世纪末年，丰臣秀吉才统一国内。17世纪初，德川家康打败秀吉的遗子，掌握政权，分裂时代告终，天下太平，文运也随之复兴。但在1635年，家康孙家光宣布锁国，除了与李朝朝鲜继续来往通信使以外，和其他亚洲、欧洲诸国断绝邦交，只允许在长崎和中国、荷兰做贸易。

江村北海（1713—1788）著《日本诗史》说：

我邦与汉土，相距万里，划以大海。是以气运每衰于彼，而后盛于此者，亦势所不免。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。……五山诗学之盛，当明中世，在彼则李（梦阳）、何（景明）、王（世贞）、李（攀龙），唱复古于前后，在此则南宋、北元，专传播于一时，其距宋、元之际，亦二百年矣。我元禄（1688—1704），距明嘉靖（1522—1566），亦复二百年，则七子诗，当行于我邦，气运已符。

日本汉文、汉诗的作风,比中国晚 200 年,才接受影响。我想这个理由,大概是日中之间有李朝朝鲜,中国时兴的诗风,先传到朝鲜,流行了一定的时间,后来由国家使节朝鲜通信使,才把这新的风尚带到日本来。这样的过程,要花 200 年的时间。

江村说:元禄时,明七子诗很流行。这是由荻生徂徕(1666—1728)提倡,当时汉诗人都随之,乃成就这样的情况。此后山本北山(1752—1812)反对七子,主张性灵,以公安派为模范。不过在他以后,不少汉诗人却学清诗,特别是学袁枚(1716—1797)。当时日本人读明诗或者清诗的目的,不止是欣赏,而且要学着做,从而使自己的诗提高。

17 世纪,日语文学方面,俳句从和歌里独立,成为一种文学样式。俳句作家有时把唐、宋诗的意境借用在他们的作品里。俳句大师芭蕉(1644—1694)根据杜甫“白小群分命,天然二寸鱼”这两句,作了“曙天来,白鱼一寸白”;又用苏轼“……山色空濛雨亦奇。若把西湖比西子,……”这首诗,作了“象潟啊,合欢花开在雨里,好像西施睡”。他们的散文中也常用唐、宋诗文。例如,芭蕉《奥羽纪行》的开头,是借用了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;游览平泉,则想到杜甫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的诗句。

另一个俳句作家芜村(1716—1783),比芭蕉晚 100 年左右,用中国典故比芭蕉更多。例如他“好冷哩!青葱漂流在易水”的俳句,就是从荆轲故事中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诗句脱胎而来。

17 世纪以后,一个从来没有的现象开始了。以前中国文

学对日本的影响,都是诗、文;而从这时以后,中国小说也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日本接受中国小说,有两个方法:翻译和改写。所谓改写,即把中国故事改做日本故事,写成新的小说。中国文言小说,明代瞿佑的《剪灯新话》早有复刻和翻译。其中《牡丹灯记》最初翻译过来以后,浅井了意(?—1691)把它改做日本的故事,题为《牡丹灯笼》,收在他的小说集《伽婢子》(1666年刊)里。三游亭圆朝(1839—1900)又把它改做“讲书”,题作《怪谈牡丹灯笼》。题名虽然是怪谈,其实圆朝是把灵怪故事改为侦探小说了。

白话小说也和文言小说一样,有翻译和改写。例如都贺庭钟(1718—约1800)的《英草纸》(1749年刊)里,就有把“三言”中的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、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、《庄子鼓盆成大道》、《裴晋公义还原配》改编做日本故事的小说。

章回小说的翻译和改写,其影响比短篇小说更深更广。《三国志演义》有文山译(1689—1692年刊),《水浒传》有冈岛冠山译(1757—1790年刊),《西游记》有西田维则等译。后来这些翻译,都加了图画,非常流行,老百姓都知道这些故事。把《水浒传》借来改写为日本故事的也不少。建部绫足(1719—1774)的《本朝水浒传》(1773年刊)、山东京传(1761—1816)的《忠臣水浒传》(1799—1801年刊)、泷泽马琴(1767—1848)的《倾城水浒传》等皆是。

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前半叶,是日本所谓江户时代。这一时代接受中国文学的情况,从诗、文到白话小说,是很全面的。江户时代以前,就日本来说,中国文学是唯一的外国文学(朝鲜士大夫文学也是汉文、汉诗)。所以日本的文学家,一

直十分认真地学习中国文学,写作汉文、汉诗,同时也使日语文学丰富、美丽了。

六

明治维新以后,中国文学已经不是日本唯一的外国文学,而成为与欧美文学等并列的外国文学之一。但是传统上,文人们关于中国文学的素养依然很深。例如明治的大文豪夏目漱石(1867—1916)就能作很好的汉诗;大正时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(1892—1927),有时还讲到清末流行的“同光体”诗。

现在,一般日本人对中国文学的知识,没有以前那么多。可是欣赏汉诗的人,爱读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人还是不少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,吸收也很多。例如鲁迅作品的翻译,就收在中学课本里。总之,中国文学在日本人心目中,是最亲密的外国文学。

清水茂 1925年生,京都大学名誉教授,日本东方学会监事、关西支部长。

主要著述:

《讲诵的文学》,筑摩书房,1988;

《中国诗文论藪》,创文社,1989;

《中国目录学》,筑摩书房,1991。

中国史学在日本

竺沙雅章

在近代以前的日本,中国史研究是怎样一种情形?这是个很有兴味的题目,但几乎从来没有人论述过。因为日本的中国学,即所谓汉学,向来以经学、儒学为中心,历史学则显得无关紧要。实际上在近代以前,关于中国史的通史或者通论,都没有出现。尽管如此,中国史并没有被完全忽视。不论在哪个时代,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中国史书都被广泛阅读,并不断有人对其进行训诂考证。只是这种阅读的目的,或是作为政治上的借鉴,或是作为日本史编纂的范本,而不是对中国史本身进行研究。就是说,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,在近代以前的日本,并没有形成。因此,本文所说的日本的中国史学,主要不是指其作为学术的自身,而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史书的传来和普及,以及对日本史学的影响上。

在写作本文时,笔者参考了不少先学的著作,于坂本太郎的《日本的修史和史学》(日本历史新书,至文堂,1966年初版)受益尤多,这里谨致谢忱。